

公民社會的山間小徑  
——從虛擬邁向真實

文/李達寧

2003 年的七一遊行已屆十年。我們可以如何理解這十年來的香港社會？其中一個最常被學者使用的概念無疑是「公民社會」。當然公民社會有多種解釋。如果認為戴耀延佔領中環是公民社會的明確表現，那麼公民社會就順理成章包含一些自由主義價值，例如自由、平等、法治、民主普選。明顯是一種民主政治的願境。然而這種自由主義式的理解是否可以順利捕捉這十年來香港社會的轉變？本文希望可以從行山遠足為引子，作一種側面觀察。

2003 年除了七一，亦有另一個重要事件，SARS 襲港。香港人忽然明白健康的重要，亦更重視家庭。由此亦改變了許多香港人的生活習慣。如果你有行山，大概會發現每逢假日，香港各處的郊野公園越來越多遊人。西貢的山路在假日幾乎是絡繹不絕。不想行山又想欣賞鄉郊美景？原來還有多個選擇：到下白泥看日落；到南生圍野餐；坐船出海探訪世界級地質公園；到大嶼山摸蜆。想再簡便點？可以去一趟濕地公園觀鳥。都去過了？自命身手好的可以參加進階的行澗（沿山澗而上）或網遊（攀爬海邊岩石），每星期也有專人組團出發。簡單而言，香港人近年來的確開發了大量「親親大自然」的假日活動。根據筆者的個人經驗與觀察，這些活動的興起為近十年之事。

嚴格來說，這些轉變與公民社會的發展沒有多少關係。首先，行山郊遊並不涉及政治，亦不是社運的一部份，與自由主義的政治願境無關。再而，行山亦不構成消費和商業活動。與古典的公民社會討論，以家庭以上，國家以下的工商業社會運作為內容的講法，亦無關係。簡單而言，僅為一種文化生活的轉變。

但稍為留意社會運動，就可知道行山遠足的文化有其政治後果。近年社會運動的一個新方向正是鄉郊保育。多個涉及自然環境的發展項目都遇到市民的反對。例如南生圍、大浪西、龍尾海灘，都有人在網上發起運動，組成關注組，與發展一方周旋。留意各關注組的網上文宣，可知他們十分強調這些自然美景是屬於全港市民的，是生活的一部份。文化生活的擴闊，使人關注城市的環境。部份人可能無意參與政治，介入政治社會、政黨政治，卻因為公有空間（自然美景、郊野公園）被破壞，而組織起來，成為公民社會的一部份。

這些轉變帶來什麼啟示？最明顯的當然是再次支持了公民社會過去十年長足發展之說。更多人認識到香港作為一個城市，有許多公共議題需要市民關注。這種公民社會或社會

運動，往往可以集合民間的力量，抗衡商界或政府，逼使發展項目更符合法治社會下的各項條件，例如公眾諮詢、環境評估、業權釐清、城市規劃、程序公義等等。

當然，從以上所論，行山仍然是次要，重點是市民由之醞釀出更多公民參與。但本文認為可以再後推一步，從行山文化說起。行山的興起，實在道出另一個香港社會的重要轉變，就是經濟人（Homo Economicus）意識的瓦解。

所謂的「經濟人意識」，簡單而言就是相信個人努力向上，可以改善生活條件的「獅子山精神」。這種意識在八九十年代當道，被視為真理。當時，香港人的偶像是李嘉誠，嚮往的是他白手興家的故事。很多人真心相信香港機會處處，無論是什麼社會階層，憑著一己的拼搏努力，加上一點點運氣，隨時可以發達。對，是「發達」，那麼簡單的描述，不像今日的抽象遙遠的「向上流動」。當然今日重提香港故事已是恍如隔世。李嘉誠的偉大形象亦來個 180 度轉變，成為地產霸權的代表人物。以前人人望發達，今日做到半個中產，買一個私人單位已是萬幸。當年的民心勃發與今日的怨氣瀰漫自是極大對比。個別高官或商界人士，不知真心還是假意，希望再用當年的神話激勵香港人，意圖消滅怨氣，卻是太過漠視當年今日的社會差異。

或許我們應該反問一個問題：為何香港的公民社會要到 2003 年以後才有長足的發展？作為一個高度發展的商業城市，享有自由、法治的條件，為何沒有令我們早就成為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就此筆者大膽提出一個假設。公民社會的欠缺，皆由香港人的經濟人意識當道，而背後實由兩大條件支撐。

回溯歷史，香港在六七十年代社會運動四起，更有武力抗爭出現，與經濟人專心賺錢的風格截然不同。然則經濟人的主流意識實乃八九十年代才建立。這種意識絕不是無心插柳，而是有意經營的結果。當時誰會想香港人遠離社會運動和武力抗爭？當然是高明的英國殖民者。從諸多討論可知，經歷六十年代的社會動盪，港英政府希望以良好的管治安撫民怨，同時又要為將來的香港前途談判增加籌碼。今日香港人所認識的現代社會制度和價值，都是七八十年代所確立的。與九十年代後期流行的小政府大市場論述不同，當年的麥理浩政府大力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無論是醫療、教育、社會福利、基礎建設都有長足的發展；同時又致力肅貪倡廉，確立現代化的公務員制度。這些措施令香港的民生大大改善，連基層也可以感受到轉變。

港英政府故然是為了克服社會矛盾而強政勵治，但一般香港人卻沒有認為這是他們政治參與的結果。即是說，這種現代化的社會秩序純然是為政者的賜予。香港人沒有經歷過什麼政治組織和鬥爭去實現這個處境。甚至，政治組織和鬥爭只令人想起 67 年的左派暴動，被視為挑戰社會秩序，影響民生的行為。在好些人的經驗中，香港人只要專心搵食，社會就變得清明，生活保障也慢慢加強。這是經濟人意識的第一個條件。

另一個重要條件，也是上一個條件的重要基礎，就是由七十至九十年代的全球經濟發展。七十年代起，西方資本開始流向東亞，尋找廉價生產力。香港與其餘亞洲小龍一起，成為西方資本的工業生產中心，經濟開始起飛。這是七十年代政府可以大量增加開支，建立社會保障的條件。直到七十年代末，冷戰結構發生重大轉變，就是中國開始改革開放，讓西方資本進入共產中國。自八十年代起，香港就成為資金進入中國的前線。工業慢慢轉移入中國，而商業、金融則大大加強。歷經七十至九十年代，香港才成為今日所見的國際金融都會。這期間香港經濟急速發展，造就香港遍地黃金之說。香港人普遍生活水平提昇，又適逢工業轉向服務金融的發展，令很多人相信個人知識增值，的確有助個人經濟環境的改善。只要努力，無論是工作或學習，就可以改善個人與家庭的處境，在當時不完全是神話。當然，同時有很多未能轉型的工人，在工廠北移，產業掏空下，就被貼上不夠努力、自食其果的標籤。

在這種背景下，產生出特定的經濟人意識。根據古典經濟學的講法，經濟人惟一關心的是用效率最高的方法去獲得財富。然則財富成為人最重要的考慮，實則亦預設了市場。既然財富是人生的最重要部份，那市場就是惟一重要的生活場域。由此觀察，作為經濟人的香港人，認定市場是最合理的活動場所。因此市場外的活動，皆被貶低或質疑。市場傳統以來當然是公民社會的重要部份。特別之處是，香港人完全漠視公民社會的社會和政治面向。原因是，香港的自由市場之建立，是自上而下的制定，香港人從來沒有以公民身份去爭取或捍衛自由貿易的權利。對大部份香港人而言，自由市場是非政治的場所。結合對共產中國的理解，以政治介入市場很容易令人聯想到共產主義，是以政治取消市場。在經濟整體向上，人人生活改善的年代，市場就被視為一個公平競爭的樂土。政治則被視為干預樂土的力量。如果有人以政治的手段影響財富分配，就是破壞公平的自由市場。結果是香港人的生活只剩下工作，除此之外就是同為市場行為的消費。遇有生活困難，不應該求之於政府，而是透過個人努力在市場中改善生活。如果市場環境轉變，就要盡量適應，而不要靠政府的干預。

不得不強調，以上的論述只是一種意識，實際的社會運作未必與之相符。例如麥理浩年代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一方面自稱不會干預市場，但另一方面則是大量增加社會保障。但正是這種看似矛盾的政策提供了「自由市場」所需要的框架，同時讓香港人相信自由市場可以獨立於政治而存在。正正是這種意識一直阻礙了公民社的成長。就算是經歷了 89 年六四事件，社會出現民主回歸的要求，但也沒有轉化成普遍對政治和社會的關注。恐共的情緒帶來了移民潮，卻沒有瓦解經濟人的習慣，香港人仍然相信「搵食」的硬道理。這是 2003 年以前沒有公民社會的原因。

直至 2003 年，真正的轉捩點出現。我們觀察到由那年起，香港人不再是單純的經濟人。「政治化」仍然是一個負面標籤，但事實是自 2003 年起，香港政治變得激進化，抗爭文化得以進入議會，意味政治化亦有市民支持。同時大量民間團體湧現，公民社會日見強大。不可遺漏的是左翼團體自 08 年金額風暴大量出現；最近的碼頭罷工更得到市民

同情，獲得大量金錢和物資支持。

為什麼是 2003 年呢？事實上，經過 97 的主權移交，穩定香港人作為經濟人的兩大因素已是漸漸消除。首先，在經濟環境上，香港再不像以往般整體向上。七十年代，經濟發展的確把越來越多人納入膨脹中的經濟體。八十年代開始，雖然部份人開始面對轉型問題，但又有部份港人配合西方資本進入中國，成為北進資本，靠大陸的廉價勞力進行資本累積。至九十年代中後期，其實產業掏空的情況已出現，但由於英殖民地隔炒賣和實用市場的措施仍在，資產價格並未暴升，所以民生未至有太大影響。但至此，香港已徹底變成一個金融服務業城市。除了專業中產生及仍然膨脹的金融，就只剩下維持這個城市的服務業，產業形成兩極化。簡單而言就是一個 M 型社會，這是香港配合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

另一個方面，社會資源再分配又面臨失敗。原本金融業賺了錢，也可以用透過政府作財富再分配，惠及各階層。但現實是主權移交後，香港政府跟隨新自由主義的潮流，不單沒有再分配財富，反而透過高地價政策及減少政府參與，助長資產價格上升（簡單表現為高樓價，貴租金），令貧富懸殊更加嚴重。這背後有更複雜的政治經濟原因，但也是成就金融中心地位的必要之惡。

在此兩大轉變下，以往對香港人甚有說服力的經濟神話終於破滅。2003 之所以重要，乃是以上的惡果終於完全向港人呈現。我們再不敢說香港遍地黃金、機會處處。個人努力不見得在大環境下可以改善生活。2003 年七一大遊行有五十萬人上街，即是說這五十萬人已脫離純經濟人的意識，認為遊行這種政治行動是有意義的。市場並不是惟一合理的生活場所。

經濟人意識體現為對香港人生活的種種限制。我們不碰政治，不理解藝術，連可以賺錢的文化產業也沒興趣，只因它掛了個趕客的名字。但這些自 2003 年後也慢慢改變過來。讀者可能認為現在香港也不見得是個文藝綠洲，爭取民主也是不見前路；但老實說我們十年前的起點比現在更低。各種在市場以外的活動開始有空間，某些抗爭性較少的就更是發展長足，如行山郊遊、有機食物、環保、以慈善立場關注基層。

在經濟人意識分崩離析的當下，香港人的確帶來許多驚喜。有時甚至令人以為「階級鬥爭」這種激進的視野也可以提上議程。（事實上它的確因為碼頭工人罷工，上了副刊的頭版。）但同時也可以令人震驚，以族群政治為口號，似乎可以動員大量群聚。用自由主義的話說，香港終於進入一個多元的社會，除了搵食和市場外，我們都願意相信不同的思想，認為那裡有崇高的價值。現代社會的諸神之戰，終於臨到。這也是公民社會的應有之義。

走筆至此，不得不坦誠，筆者乃以左翼自居，視自由主義和公民社會為思考政治經濟問

題的局限。但對於這種公民社會的進展，始終抱持希望。原因並不是因為支持公民社會，而是認為這是破除經濟人意識的自然結果。惟有在這總多變活躍的處境下，左翼運動才有生機。2003年兩次大規模的罷工得到市民支持，左翼團體紛紛出現，馬克思主義者不一定是失常，這些都在在說明香港社會的轉機。